

JINGJI 张 伟 著

TIZHI

ZHUANGUI

JIXIAO

YU

CHENGSHI

HUANJIANG

SHESHI

TOUZI

TIZHI

GEAN

YANJIU

经济体制转轨绩效与
城市环境设施投资体制个案研究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最终成果

经济体制转轨绩效与城市环境
设施投资体制个案研究

张 伟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体制转轨绩效与城市环境设施投资体制个案研究/
张伟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 12
ISBN 978-7-203-05620-1

I. 经… II. 张… III. ①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中国
②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研究—中国 IV. F121 F299.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201657 号

经济体制转轨绩效与城市环境设施投资体制个案研究

著 者:张 伟

责任编辑:员荣亮

装帧设计:杨 子

出 版 者: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030012

电 话:0351-4922220(发行中心)

0351-4922208(综合办)

E-mail: fxzx@sxskcb.com

web@sxskcb.com

Renmshb@sxskcb.com

网 址:www.sxskcb.com

经 销 者: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太原市力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7

字 数:300 千字

印 数:1-300 册

版 次: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03-05620-1

定 价:35.00 元

本书系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体制转轨
绩效的统计评价与实证研究》

(项目编号:04CTJ00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民经济
市场化进程的统计评价方法研究》

(项目编号:02BTJ003)

的最终成果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体制转轨绩效的统计评价与实证研究》和《国民经济市场化进程的统计评价方法研究》等成果的基础上,经过多次大的整合、修改而成的。本书包括四个部分:一是经济体制转轨及其绩效的理论研究;二是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绩效的统计测算;三是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绩效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建议;四是中国城市环境设施投资体制转轨绩效的个案研究。

在第一部分中,本书阐述了经济体制转轨及其绩效的基本理论。对经济体制、经济体制转轨进行了界定,对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动因和进程进行了回顾,重点对已有的相关成果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梳理、比较,对本书提出的经济体制转轨的“绩效”进行了限定。

在第二部分中,本书完成了对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绩效的测算,即中国经济改革对经济发展的贡献问题。研究表明:从促进经济增长的角度看,通过体制转轨,增加制度变量供应,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从节约交易费用的角度看,1991年—2004年的14年间,体制转轨累计节约11229.42亿元的交易费用,这一数值大约相当于2004年中国实际GDP的15.30%。通过协整分析发现,交易费用对经济增长、体制转轨的偏弹性系数分别为0.09651和-0.078136。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虽然提高了交易费用水平,但体制转轨却抑制了交易费用水平的提升速度;从节约行政管理成本的角度看也是如此。所以,中国近十几年经济体制转轨的绩效是十分显著的。这一结论为中国继续深化改革提供了依据。

在第三部分中,本书探讨了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绩效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建议。虽然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短期绩效是比较显著的,但是存在的问题也不少,突出地表现在经济增长粗放,高投入低效益、资源浪费、污染严重的现象没有得到彻底扭转,贫富悬殊越来越大,非公有制经济的积极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等。为此,需要树立科学的绩效观,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为突破口,通过实施政府的多维集成创新,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本书提出中国目前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建立直属于最高权力机构的审计监督系统,加强最高权力机构的监督职能;进行政府机构的战略性再造,转变政府职能;形成新型公共工程投资体制,重构新的公共工程投资

方式;进行审计业务的转型,开展绩效审计与问责。本书提出中国目前推行政府集成创新的途径是:开展集明晰、保护、管理和流转于一体的产权制度创新;开展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分配制度创新;开展以绿色、自主为核心的技术创新;开展以转变职能、加强公共服务为目标的公共管理创新。

在第四部分中,作为个案研究,本书分析了中国城市环境设施投资体制转轨的绩效,提出了绩效的改进路径。结果表明,中国城市环境设施投资体制转轨的绩效是非常显著的。各级政府在加大对城市环境设施投入的同时,大力吸引民有投资和外商投资,改变了长期以来城市环境设施投资不足的局面,有利于提高城市环境设施的整体投资效率。同时,还有利于拉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机会等。但是,中国城市环境设施投资体制转轨,也存在一些问题,突出地表现在投资绩效偏低。其根源在于资金来源渠道狭窄、投资主体单一和地方政府环境责任缺失。本书立足于新公共服务理论,提出了建立政府支持与市场供给相结合的城市环境设施投资体制的新思路。在此基础上,本书提出改进中国城市环境设施投资体制转轨绩效的路径是:加强专项财政融资,开征环境税,发行环境市政债券;加强战略型股权融资,重视环境金融理论的建构,扩大城市环境设施企业的股票融资,扩大城市环境设施项目的PFI融资和PPP融资;加强适当负债融资,扩大城市环境设施项目的国际贷款融资、政策性融资、商业性融资、企业债券融资和ABS方式融资,进行财政型政策性融资机构和污染权质押贷款的专题探索;加强城市环境设施项目的立项决策、运营管理,强化出资人和政府有关部门的责任,完善科学民主决策的体系和机制,完善运营管理的各项制度,尤其是完善社会公众参与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制度,健全城市环境设施项目决策和运营的监管制度等。

目 录

第一部分 经济体制转轨及其绩效的理论研究

第一章 经济体制与体制转轨的理论研究	(3)
第一节 经济体制的定义与内容	(3)
第二节 中国的经济体制转轨	(4)
第三节 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程度的统计测算研究回顾	(7)
第二章 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绩效的理论研究	(12)
第一节 经济体制转轨绩效的含义	(12)
第二节 与经济体制转轨绩效有关的量化研究回顾	(14)

第二部分 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绩效的统计测算

第三章 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程度的统计测算	(19)
第一节 经济体制转轨的主要内容	(19)
第二节 经济体制转轨代表性变量的设计	(21)
第三节 经济体制转轨程度的综合评价方法	(22)
第四章 从促进经济增长角度对经济体制转轨绩效的统计测算	(28)
第一节 经济增长与经济体制转轨变量的关联度测算	(28)
第二节 经济增长的制度决定模型及制度弹性测算	(32)
第五章 从外在性交易费用节约角度测算经济体制转轨绩效	(35)
第一节 作为衡量体制效率尺度的交易费用水平	(35)
第二节 中国外在性交易费用的测算方法	(36)
第三节 中国外在性交易费用测算结果	(38)
第四节 基于截面数据的交易费用决定模型	(40)
第五节 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绩效绝对量的测度	(43)
第六章 经济体制转轨对交易费用水平的动态节约效应测算	(46)
第一节 整体性交易费用定量测算	(46)
第二节 研究方法	(49)
第三节 经济体制转轨与交易费用的协整关系	(52)
第四节 体制转轨对交易费用的动态冲击	(55)
第五节 结论	(58)

第七章 经济体制转轨对行政管理成本节约效应的统计测算	(59)
第一节 有关研究回顾	(59)
第二节 样本与数据	(60)
第三节 经济体制转轨程度与行政管理成本的协整分析	(63)
第四节 基于 VAR 模型的冲击响应与冲击分解	(66)
第五节 本章小结	(68)

第三部分 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绩效存在的问题与 对策建议

第八章 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绩效存在的问题探析	(71)
第一节 中国经济体制转轨中的产权问题	(71)
第二节 中国经济体制转轨中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	(74)
第三节 中国经济体制转轨中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78)
第四节 严峻现实要求树立和谐型的绩效观	(81)
第九章 改进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绩效的政治改革路径	(82)
第一节 建立直属于最高权力机构的审计监督系统	(82)
第二节 进行政府机构的战略性再造	(83)
第三节 形成新型公共工程投资体制	(85)
第四节 加强对政府部门的绩效审计和问责	(86)
第十章 改进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绩效的政府多维集成创新路径	(91)
第一节 开展集明晰、保护、管理和流转于一体的产权制度创新	(91)
第二节 开展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分配制度创新	(94)
第三节 开展以绿色、自主为核心的技术创新	(96)
第四节 开展以转变职能、加强公共服务为目标的公共管理创新	(99)

第四部分 个案研究——以中国城市环境设施 投资体制转轨为例

第十一章 中国城市环境概况及城市环境设施投资体制转轨的绩效分析	(109)
第一节 中国城市生态环境面临的严峻形势	(109)
第二节 中国城市生态环境污染带来的危害	(110)
第三节 中国城市环境设施投资体制转轨的绩效分析	(114)

第十二章 新公共服务理论与城市环境设施投资体制转轨绩效的改进	(127)
第一节 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发展	(127)
第二节 公共物品与新公共物品供给思路	(131)
第三节 新公共物品供给思路对城市环境设施投资体制转轨绩效的改进	(137)
第十三章 专项财政融资与城市环境设施投资体制转轨绩效	(144)
第一节 中国财政收支与环境财政体系的建立	(144)
第二节 中国税制的绿色化与环境税	(148)
第三节 环境市政债券	(158)
第十四章 战略型股权融资与城市环境设施投资体制转轨绩效	(165)
第一节 中国融资概况与环境金融理论的建构	(165)
第二节 城市环境设施项目的股票融资	(170)
第三节 城市环境设施项目的自身融资—PFI 方式	(174)
第四节 城市环境设施项目的自身融资—PPP 方式	(180)
第十五章 适当负债融资与城市环境设施投资体制转轨绩效	(189)
第一节 城市环境设施项目的国际贷款融资	(189)
第二节 城市环境设施项目的政策性融资	(192)
第三节 城市环境设施项目的商业性融资	(195)
第四节 城市环境设施项目的企业债券融资	(203)
第五节 城市环境设施项目的 ABS 方式融资	(207)
第十六章 立项决策、运营管理与城市环境设施投资体制转轨绩效	(212)
第一节 工程项目立项的决策原则与问题	(212)
第二节 城市环境设施项目实施科学民主决策所需的外部氛围	(213)
第三节 城市环境设施项目立项实施科学民主决策的内生机制	(217)
第四节 城市环境设施项目立项实施科学民主决策的实证分析	(220)
第五节 完善城市环境设施项目的运营管理制度探讨	(225)
第六节 加强城市环境设施项目运营管理探讨	(228)
第七节 对城市环境设施项目实施监督管理的探讨	(237)

第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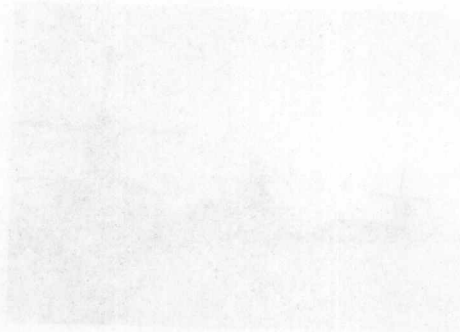
经济体制转轨 及其绩效的理论研究



第一章

静海湖畔的清晨 太阳升起的时候

静海湖畔的清晨，
太阳升起的时候，
微风轻拂着水面，
带来阵阵清凉。



静海湖畔的清晨，
太阳升起的时候，
微风轻拂着水面，
带来阵阵清凉。

第一章 经济体制 与体制转轨的理论研究

第一节 经济体制的定义与内容

一、广义的经济体制

广义的经济体制是社会经济运动的组织制度形式和运动形式,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由国家根据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和本国的国情特点,以法律规范的形式确立起来的组织和协调全部社会经济活动的组织管理体系和运行体系。一般包括:所有制结构、经济决策结构、经济调节体系、经济利益和经济动力结构、管理组织和管理方法等方面。

从概念角度讲,经济形式是最基础的层次,经济制度是最高层次,中间是经济体制。所以经济体制在社会生产关系中处于联系经济形式和经济制度的中介地位。一方面,经济体制与经济形式相联系,它所协调组织的对象是经济形式的运动,合理的经济体制必须反映经济形式的特点和要求;另一方面,它又与经济制度相联系,是一定经济制度下的人们为实现经济制度目标而自觉建立起来的,是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但人们建立经济体制也必须考虑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和经济形式的特点和要求,并根据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形式的变化情况而选择不同的经济体制。这就是人类社会历史上不同经济制度或不同国家可以采用同一种经济体制,而同一经济制度或同一国家的不同阶段又可以采用不同的经济体制的原因所在。

二、狭义的经济体制

狭义的经济体制又称为经济机制,是资源的配置方式,是指经济运行过程中,经济组织或经济系统内部和外部各个构成要素、各部分、各环节之间相互制约和相互联系的方式及组织或系统运作的机理。

经济资源需要配置,是由于它具有稀缺性。所谓稀缺性,是指各种资源,相对于人类的需求来说,都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搞好经济的关键就是最恰当地运用有限的资源,实现“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那么,社会的

稀缺资源如何才能得到高效率的配置呢?在经济生活中,稀缺资源的配置是通过狭义的经济体制(即经济机制)的调节来进行的。

经济体制大体分为三种基本类型:

一是传统经济体制。传统经济体制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在这种体制下,生产力水平低下,分工简单,每个经济单位都是自给自足的封闭体系。决策权的分配来源于传统的血缘关系和人身依附关系,信息结构十分原始,物质刺激的作用很小,传统习惯和超经济是经济运行的主要动力,不同经济单位的经济决策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和协调。在这种经济体制下,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十分缓慢,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二是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基础上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源分配受消费者主权的约束,生产什么取决于消费者的需求(市场需求),生产多少取决于消费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水平;经济决策是分散的,作为决策主体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在经济和法律上的地位是平等的,不存在人身依附和超经济强制关系;信息是按照买者和卖者之间的横向渠道传递的。经济动力来自于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分散的决策主体在谋求各自的利益中彼此展开竞争,决策的协调主要是在事后通过市场来进行的。整个资源配置过程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

三是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国家曾经一度采用的经济体制。它是以现代化大生产和传统的国有制为基础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决策权高度集中,几乎所有的经济决策权都集中于中央一级;经济运行的过程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命令来推动的;信息的流动主要是纵向的,集中于上下级之间,信息的内容主要是实物指标;经济的协调是事前由中央计划机关完成的,整个社会经济运动被置于中央计划机关的控制之下,社会生产变成了一个大工厂。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仿照苏联的做法,建立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之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二节 中国的经济体制转轨

一、经济体制转轨的定义和内容

如何定义经济体制转轨,直接影响本书的研究方法和结论。纵观国内外的有关研究成果,大多是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定义经济体制转轨(即市场化进程)的,但也有些考虑了更多的因素。比如,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课题组认为,经济体制转轨(市场化)是指资源配置方式由政府行政配

置向市场调节的转化,具体说,就是“取消或放松国家对商品生产要素供求数量及价格的管制”。陈宗胜认为,市场化进程是市场机制在一个经济中对资源配置发挥的作用持续地增大,对市场机制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增强的演变过程。市场机制包括供求、竞争、价格、风险、利益机制等,是市场化理论含义的延伸。在这些机制对经济生活的调节作用逐步增强的过程中,政府和企业的各个方面都要相应发生变化,比如分散化、多元化、自利性、自主性、少干预、秩序化、规范化等。樊纲等则认为市场化的含义在不同的阶段有所不同:“在我们已经经历的阶段上,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比重减少,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加大等等是体制改革的主要方面,较为突出地反映着这一阶段的成果;而在未来的某些阶段上,法治化进程、政府职能的转换、金融市场的发展、国际化程度的提高等等,可能成为体制转轨的更重要内容和更重要的标志。”与国内这些学者的认识类似,美国传统基金会的研究者将经济自由定义为“对于政府在生产、分配、消费等方面控制的解除”。可见,对于体制转轨的基本含义,这些研究者都赞同是由政府配置资源向市场配置资源的转轨,只是在观察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

为了兼顾定义的科学性和数据的可获取性,本书定义的经济体制转轨的“经济体制”的概念要比广义经济体制的范围略小一些,比狭义经济体制的范围略大一些。具体讲,是从如下三个角度理解经济体制转轨的:

第一,从产权结构和经济组织角度看,中国的经济体制转轨是从国有经济“一统天下”到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转轨;从企业组织制度看,是从僵化低效的传统企业制度向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的转轨。

第二,从资源的配置方式角度看,中国的经济体制转轨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完成经济运行机制由政府主导的计划机制向市场主导的市场机制的转轨,完成经济体制由僵硬的计划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现代市场体制的转变。按照这一理解,经济体制转轨过程实际上就是国民经济市场化的过程。

第三,与前两个方面相适应,从经济组织和外部环境之间相互联系的角度看,中国的经济体制转轨就是由内向型经济体制向外向型经济体制的转轨,是从封闭式经济体制向开放式的经济体制的转轨。

二、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动因

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思想的提出和实施,其根本原因在于在中国比较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计划经济体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低效率。计划经济体

制在社会主义经济建立初期,虽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其弊端日见明显,从而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先后进行了以“市场取向”为特征的改革,程度不同地引入了市场机制,更多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然而,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并最终明确提出进行经济体制转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思想观念上有一个转变的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越来越凸现出来。虽然我们在 80 年代初已开始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但仍强调“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种种问题表明,如果不建立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就会严重阻碍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

1985 年 10 月,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并强调“中国不走这条路,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这条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1987 年 2 月,邓小平又指出:“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

党的十三大更加明确提出,要加快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等商品市场,而且应当包括资金、劳动、技术、信息和房地产等生产要素市场。1992 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同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最终确立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以 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自觉地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阶段。

中国的经济体制转轨的目标经历了计划经济,(开放前)市场调节为辅、计划调节为主(1982 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4 年),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87 年),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1989 年)几个阶段,并且中间几经反复,至此逐渐有了明确的定论。明确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目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不仅是对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社

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总结,从根本上破除了传统计划经济理论的束缚。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勾画了新体制的基本框架,为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指明了方向。党的十五大、十六大继续推进理论创新,在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理顺收入分配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进一步做出创造性的理论贡献,为推动经济体制转轨实践的不断突破,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操作指南。

第三节 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程度 的统计测算研究回顾

一、国民经济整体转轨程度的统计评价回顾

按照前面的介绍,不同研究者对经济体制转轨的理解并不相同,所以对如何评价经济体制转轨的程度,不同的研究者有着不同的方法。即使研究者对经济体制转轨的理解相同,但不同的研究者的观察角度及使用的标准不同,其评价结果也会有很大差异。

现以从狭义角度(资源配置方式)理解经济体制转轨的研究者为例予以说明。尽管它们将经济体制转轨都理解为国民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但他们设计的衡量市场化程度的指标体系、评价方法和结论也存在很大的差别。比如卢中原、胡鞍钢(1993)提出了用4个指标测度市场化程度。这4个指标是:投资市场化、价格市场化、工业生产市场化、商业市场化;江晓薇、宋红旭(1995)提出的测算指标是:企业自主度(包括企业的14项自主权)、市场国内开放度(包括农业生产、工业生产、物资流通等6个指标)、市场对外开放度(包括进口依存度等3个指标)、宏观调控度(包括税负负担等5个指标);国家计委课题组(1996)是从商品市场(包括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的市场化程度和要素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入手进行测算的。商品市场(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程度用国家已经放开、主要由市场进行调节的那一部分商品(生产要素)占全部商品(生产要素)的比重来反映;顾海兵(1997)则是从要素市场化方面进行研究。他提出的测度指标包括劳动力市场化、资金市场化、生产市场化、价格市场化4个方面14个指标;徐明华(1999)则设置了8个方面的31项指标。这8个方面包括:所有制结构(包括工业总产值中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等5个具体指标);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效率(包括GDP与政府消费之比等6个具体指标);投资的市场化(包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非公有经济投资的比重等3个指标);

商品市场化(包括出口总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等3个指标);要素市场发育(包括合同制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重等5个指标);对外开放(包括外贸依存度等2个指标);经济活动频度(包括每万人商业网点数等3个指标);人的观念(包括每万人个体户数等4个指标)。

测度市场化程度最终必然要进行定量汇总。不同研究者使用的方法也各有特色,大多数研究者最终计算出市场化的水平值,这一水平值表现为一个介于0%—100%之间的百分数,百分数越高,说明市场化水平越高。方法一般是:先将指标体系中的各个指标根据其重要性的不同赋予不同的权重,然后加权平均,最后得到反映市场化进程的总指数。这是大多数研究者采用的方法。以卢中原、胡鞍钢的研究为例。他们设计了一个综合市场化指数来综合反映中国的市场化水平,它由四个单项指数按0.3、0.3、0.3和0.2的权重加权平均而成。用文字表示,其公式就是:

综合市场化指数 = 投资市场化指数 × 0.3 + 价格市场化指数 × 0.3 + 生产市场化指数 × 0.3 + 商业市场化指数 × 0.2

由于使用的指标和汇总方法的不同,所以最终的测算结果相差很大。比如,同样是对中国1994年的经济市场化测度进行评估,江晓薇、宋红旭测算的结果是37.6%,而国家计委课题组的测算结果却是65%,相差27.4个百分点,差率达72%;顾海兵测算的1996年中国市场化程度为40%;而陈宗胜测算的1997年中国市场化程度为60%,相差20个百分点,差率达50%。各种方法的测算结果的差别之大可见一斑。

二、各经济领域的体制转轨程度

同样,按照狭义的理解,各经济领域的体制转轨程度就是各经济领域的市场化程度。各经济领域的市场化程度的测算步骤与国民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测算过程大同小异,此不赘述。下面是几种主要的测算结果:

(一) 商品流通领域

商品价格形成的市场化是一般商品交换市场化的关键。所以其转轨程度最受研究者重视。表1—1是研究者对商品流通领域市场化程度的测算结果。

(二) 生产要素流通领域

与一般商品交换的市场化相比,生产要素的市场化进程比较慢。各种测算表明,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程度平均还不到50%(见表1—2)。各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很不平稳,其中,劳动力市场和技术市场的发育程度相对高一些。但在城乡劳动力市场还存在着严重分隔的情况下,对劳动力市场化